

117
新華書局

瓦爾加批判

依·甫捷夫等著



新華書店發行

瓦爾加批刊

依·甫拉捷夫等著

目次

一、關於一個經濟學問題的論戰.....	1
二、反對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中的改良主義傾向.....	10
	拉甫捷夫(二)
	E. 瓦爾加(三)

關於一個經濟學問題的論戰

依·拉甫捷夫

不久以前出版的「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雜誌第十一期的附錄，曾發表了爭論B·瓦爾加的著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的速記記錄。這個爭論是在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政治經濟部和莫斯科國立羅曼諾索夫大學的政治經濟系的聯席會上舉行的。

討論的目標是爲了判明瓦爾加同志書中所闡述的現代資本主義及其發展前途的各種問題之正確程度如何。

爭論時瓦爾加同志在致辭中曾說：「如果你們問我在一年半以後（指瓦氏著書出版後——譯者註）是否認爲必須改正某種理論上的觀點（除了論述人民民主特質的問題以外），我應該答道，同志們，不需要。」

許多著名的經濟學者的發言都對瓦爾加同志書中的很多基本論點加以正確的批判，揭露了該書中含有的政治上理論上的嚴重錯誤。但是一部分的發言却企圖辯護瓦爾加同志書中的明顯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應當注意：瓦爾加同志在半年後出版討論記錄時，仍然認爲批評這些原則上的錯誤是不必要的。

瓦爾加同志檢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現階段時曾得出何種結論呢？按照他的意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濟變化中最本質的又是什麼呢？

瓦爾加同志的著書完全出乎意料地從國家在資本主義各國經濟中的作用的問題出發。因為讀者合理的認為首先需要分析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它的發展的規律、獨佔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表現的形式。只有如此之後，才能了解資產階級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者不否認資產階級國家對經濟的反作用。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並不依靠國家，乃是根據自發法則而發展的。資產階級國家在任何條件下也不能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上起決定的意義。

瓦爾加同志却得出另外的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現象之一，便是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內——交戰國與中立國，國家在戰時經濟上獲得了決定的意義。」（一五頁）

在爭論時瓦爾加同志不僅堅持這個主張，而且加以更廣泛的解釋。他說：「我的關於戰爭結束後國家的作用將會減少的論述或者不完全正確。」從他的發言可以解釋為：資產階級國家不但在戰時經濟裏，而且在戰後經濟裏也獲得了決定的意義。

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只要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便會了解資產階級國家的決定作用的理論（即僅就戰時經濟而言）就等於否認資本主義自發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等於說資本主義戰時經濟不根據這規律，而是按照萬能的國家意志而發展的，並且今後也要長久如此地發展。從這點出發，便能夠到達了如下的結論：資產階級國家可以克服價值法則的自發作用、資本蓄積的總法則、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法則、危機和失業，甚至可能變成計劃性。

瓦爾加同志在致辭中說明資本主義經濟計劃化不可能的理論業已陳舊，並企圖證明相反的論據。他說：「讓我來討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計劃性的問題。關於這問題，我們時常被舊理論所支配：認為我們能實現計劃經濟，但在資本主義則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永久而無差別的支配一切。我認為這樣看問題是不對的。」照瓦爾加同志的意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正在某種「計劃性的基礎

上」前進着，在若干資本主義國家，類似我們獨特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組織也出現了。

瓦爾加同志在估計資產階級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時所犯的基本錯誤，在於他離開資本主義獨占而觀察這一問題，甚至把國家和獨占對立起來。瓦爾加同志寫道：「資產階級國家代表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他的目標是在戰爭目的之下，盡力適當地利用國家的全資源，因此便不斷地與個別資本企業的局部利益，和他們追求高額利潤的利害關係相衝突。」（一〇頁）

書中更屢次強調在戰時國家與獨占間存在着矛盾。論戰的發言中正確地指出這種見解會得出承認資產階級國家的超階級性的結論。

現代國家在帝國主義的國度裏表現為資本家——獨占者和金融寡頭的專政。檢討國家統制經濟時，不可忘記它是為了儘可能地追求高額利潤，被獨占者通過國家而實現的。斯大林同志說：「雖然存在着『民主的』國會，但很多的資本主義政府被大銀行統治着。國會想使人們相信他們監督政府，而實際上政府的官員本身及其行動却被大的金融集團所統治。」（「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一七四頁）

獨占資本主義的本質的特徵表現於國家機構和資本獨占，金融資本巨頭的一體化，獨占資本的掠奪者利用國家機構去獲得高度額外利潤。

第二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變化的本質，表現於為了攫取新銷售市場和原料以分割世界，利用國家機構的資本主義獨占的作用極為增大。戰時經濟的主要動力乃是資本主義獨占，資產階級國家的政策服從於它的利益，後者沒有任何能力去稍有抵觸於資本主義獨占與金融寡頭的利益。資產階級國家在擬定計劃時若稍微越過獨占利益的範圍，它就不可避免的要註定失敗。

瓦爾加同志在爭論時說明：「國家在戰時不得不設法對利潤加以某種限制」及國家調節物價「不是爲了獨占的利益」。這些說法皆與事實不符。實際上，資本主義獨占在戰時的利潤較之平時

速爲增大。當美國獨占資本家增大其利潤，從一九三九年的六十四億美金到一九四三年的二百四十五億美金，當四年戰爭之間在政府的「反作用」下賺了八百七十億美金的時候，還有什麼國家對資本家的限制！

並且，美國戰時經濟的領導者們本身就否認了「國家在經濟上的決定作用」。論戰時引用了美國軍需生產管理局的負責人道納爾·納爾遜的「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美國軍需生產的歷史」書中的一節。納爾遜寫道：「工業告訴我們它的需要及其需要的時期。我們只能制定使工業所欲的那種法規。這個命題乃是決定的因素。」

不可忽視在論戰理論及獨占資本主義下國家的作用問題的發言。脫拉哈天培爾戈的發言完全是錯誤的。他以前就過高估計資產階級國家在經濟上的作用。這次論戰他又支持了瓦爾加同志的錯誤論點。例如他說：「必須承認國家干涉經濟的原則。」實際上脫拉哈天培爾戈就以這種觀點墮落到資產階級辯護人的立場，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資產階級國家作用的學說。

參加論戰的埃聞託夫辯護瓦爾加的觀點時，完全陷於極其明顯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他認爲「國家不直接干涉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問題」。他這種認識是無條件的。發言時他又二次的重述這種完全爲資產階級的奴僕——改良主義者所擁護的觀點。埃聞託夫以其這種觀點曲解了馬列主義關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學說。如衆所周知，資產階級國家乃是剝削者壓迫勞動大眾的工具。

斯米德談及巨大獨占資本與國家的結合過程時，認爲這過程意味着時刻在完成着趨向於新階段或發展的新階段的某種運動。獨占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是否可能？這不是新問題。列寧在反對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理論的鬥爭裏曾給以極爲詳盡的回答。獨占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而最後的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在戰爭之間創設國家獨占資本主義和軍事國家獨占資本主義形

式的趨勢，是獨占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與本質的表現。它並不形成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別新階段。

獨占資本主義在這形式內，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可能達到的生產社會化的最高階段。列寧寫道：「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不祇是因爲戰爭所造成的慘禍產生出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那麼任何起義也不會創造出社會主義，——而是因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進到社會主義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這樣的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稱爲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階段的。」（「列寧全集」二十一卷一八七頁）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已經到達了成熟的階段。

關於帝國主義新階段可能性的問題，瓦爾加說：「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問題尚未考慮成熟。」（?!）他自己答覆這問題如下：「可能有，可能沒有。但是總而言之，問題僅限於名稱而非其本質。」不對，瓦爾加同志！是否可能有帝國主義新階段的問題，不是名稱問題而是社會主義列寧、斯大林革命理論中基本的主要的問題之一。這一問題乃是一個早已被考慮成熟，而且早經解決的了。至於談到資本主義經濟學中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決定意義，消除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經濟的計劃性的基礎等等理論，在本質上是復辟了的機會主義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

瓦爾加同志在書中的開頭寫道：「分析爲戰爭所引起的政治上的變化並不是本書的目的。」他準備在另外的著作裏探討政治上的變化。論戰時正確地指出了本書著者將經濟問題脫離政治問題的錯誤。在這種錯誤的思想方法之下，會發生多麼嚴重的錯誤！例如瓦爾加同志將新民主國家的成立僅當作政治上的變化。實際上這不僅是政治，而首先應當是世界資本主義構成中重大的社會經濟變化，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化中頭等事件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的結果是統一的帝國主義戰線的被衝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

俄國脫離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擊潰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的結果之一，是中歐和東南歐各國從帝國主義體系的解放。

瓦爾加同志不了解，並且不正確地闡明這些國家的重大社會經濟變化。他在論述新民主國家經濟時，認為「國家資本主義佔優勢」，他更寫道：「這種新型經濟的出現（這種經濟已不能稱之為舊語意中被了解的那種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度中無論如何重要，也無論其具有多少重大的意義，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這些國家的比重比較不大，並且基本上尚未變更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前途。」（二九一頁）這等於他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不是「舊語義」），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構成部分。按照著者的意見，新民主國家的出現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並無重大意義。

顯然，瓦爾加同志的這些錯誤並不是局部的性質。它與著者對資本主義總危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陣營——民主與帝國主義的力量對比之不正確估計密切相連。

實際上，在人民民主國家裏創造了新的國家形態——人民的共和國，在那裏政權屬於民衆，以工人階級爲首的人民各勞動階級的聯盟乃是主導的力量。在這些國家裏所實行的大工業與銀行的國有化，意味着創造了國家的全民的所有制。這些國家把羣衆從帝國主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由於農業改革的結果，土地歸於農民，這就消滅了地主階級。新民主國家的勤勞人民奠定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

瓦爾加同志在論戰時說：「我承認在二九一頁裏『國家資本主義佔優勢』的用語不正確。」正如上述，這並不僅是用語的不正確；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估計也不正確。爭論時若干發言正確的批判了瓦爾加同志對於在新民主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所起的作用的過低的評價，對於土地改革意義不正確的認識，以及對於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生着的過程之非馬克思主義的估計。

在論戰中，大家很注意對瓦爾加同志的資本主義交戰國家貧窮化的奇特的理論加以批判。當然戰爭使生產力破壞、歲入不足支應戰爭耗費、使國富減少（除去在戰爭中致富的美國）等等，皆是不容置辯的事實。正如批判所指摘，瓦爾加未從階級分析上去對待這一問題。因此他未能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戰爭的主要負擔被轉嫁給貧苦大眾，同時資產階級，特別是某些階層却因戰爭致富。因此，瓦爾加同志認為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等乃是抵抗國家貧窮化過程的一種反趨勢之這一論點，便成為奇怪的事了。瓦爾加同志的貧窮化理論還另有其他意義。衆所周知，在其所編纂的「法西斯德國經濟資源的枯竭」一書裏，曾指出德國貧窮化過程及其經濟資源的不斷的消耗，在事實上從一九四一年已經開始，這首先是德國破滅的原因。

雖然在我們的刊物中曾批判了這種顯然不正確的論點，但瓦爾加同志在論戰時却固執己見。實際，資本主義交戰國家普遍貧窮化的理論與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德國在開始對蘇聯作戰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的期間，曾用掠奪被其奴役的歐洲屬國和剝削工人階級的手段擴大了其經濟資源。

希特勒德國是因爲蘇聯的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力量超越了他而失敗。爲偉大的斯大林所指揮的蘇聯軍隊，不但加速了法西斯德國的經濟枯竭，而且又是破壞敵人經濟基礎的原因和基本力量。因此企圖說明德國之敗滅於「貧窮化」的理論，不但是貧乏無力而且是可笑的。

瓦爾加同志將戰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變化分爲暫時的和長期的二類。暫時的變化將主要地決定今後十年間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長期的變化將在完全達到戰前生產水平之後才能整個的出現，按照瓦爾加同志的意見，這至少須在十年以後。「在第一期，戰時發生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將對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給以決定的影響。」在第二期，當戰爭所產生的資本主義的「澈底」的變化完全出

現時，它就表現爲『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尖銳化，社會的生產與個人的所有間的對立，並且首先出現於實現價值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市場問題上面。』（一二頁）

瓦爾加同志的這些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見解，完全不正確地把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法則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對立與分割起來。實際上它們是同時進行的。

市場問題在十年後歐洲經濟恢復完成之後才能發生的主張，是嚴重的錯誤。

例如戰爭結束後市場問題在美國就更嚴重的發生了，資本主義獨占設法保持在戰時銷售其生產品的國外市場，因爲戰爭，許多國家的購買力業已低下，並要設法獲得新的市場。美國的獨占資本企圖在政治上經濟上奴役其擴張對象的國家。這就是惡名昭著的馬歇爾——杜魯門計劃的目的。

市場問題因戰後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增長着的工人階級貧困的結果，更爲尖銳化起來。一般地說明美國生產過剩危機的日益增大，同時又認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將在戰爭結束十年後才全部發生（正像瓦爾加同志所作的），這就使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問題完全混亂。

論戰時正確地指出關於在經過十年後才能恢復歐洲諸國經濟到戰前水平問題上，瓦爾加同志犯了忽視了新民主國家特質的錯誤。這些國家業已逸出資本主義的常軌，經濟復興正以高度的速度進行，並將基本上以自己的力量完成它。

瓦爾加同志關於階級鬥爭前途的觀點也受到正確的批判。他在書中寫道：「國家的作用將來會比戰前更爲重要。或多或少少的參加管理國家問題，將成爲資本主義社會兩基本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日益增劇，兩個基本對立的階級分裂，會更爲增大無產階級的比重。」（三一八頁）

當一切道路走向共產主義時，這些話在現代聽來是很奇怪的。同時，當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業已存在三十年，許多歐洲國家成立了人民的共和國，並出現了較之任何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爲高

度形式的國家政權時，却說什麼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是或多或少的參加管理國家！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認為這種對無產階級任務的限制乃是一種改良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資本主義體系上、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對比上引起了很大的變化。第二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結果是德國與日本的敗北；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裏脫落了幾個歐洲國家，成立了人民的共和國並奠定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基礎；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獲得勝利並在戰爭中壯大起來，成立了兩個陣營——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以蘇聯為首的民主國家。這兩個陣營的鬥爭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日益尖銳化，帝國主義力量的削弱和社會主義民主力量的加强的環境下進行的。

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階級力量的對比業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例如明顯的可以看出共產黨的作用的增大、廣大勞動羣衆的左傾。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顯然，一切資本主義經濟變化的分析如果脫離上述事實便命定要遭受失敗。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本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國際間新的力量的對比，乃是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濟變化的唯一正確的真正科學的基礎。

我們經濟學者的任務乃是根據列寧——斯大林的學說深入地研究蘇聯經濟生活與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實際問題，用布爾什維克的黨性去揭發那些可惜尚流佈於我們經濟學中的敵對馬列主義的觀點。

蘇聯的經濟學這一科學部門中，是有足夠幹部以完成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任務的。

（原文載一九四八、一、二六「真理報」）

反對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中的改良主義傾向

Е·瓦爾加著

如所周知，我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吳清友中譯本譯作「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譯者）一書，以及前「世界經濟及世界政治研究所」戰後出版的所有其他著作（作為這個「研究所」領導者的我，應對這些著作負責），曾在黨報上和科學討論中受到嚴厲的批評。這些批評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我的錯誤是在於：我沒有立即承認這些批評的正確性，像其他同志那樣。可是，後來再承認究竟還比永遠不承認要好些。

不幸還不在於我這本書裏一般地暴露出錯誤，而在於這種錯誤的性質。很難在這樣一本書裏不犯錯誤，它首次試圖單獨地探討這樣複雜的問題：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資本主義經濟所產生的影響。不幸的是——正如批評正確地指出的——這些錯誤構成改良主義傾向錯誤的整個系列，它甚至意味着確定地脫離列寧斯大林對現代帝國主義的估計。

當然，改良主義傾向的錯誤也意味着世界主義傾向的錯誤，因為它粉飾了資本主義。

一切改良主義錯誤以及對馬列主義學說的明確性所加的一切損害，在當前歷史環境中是特別危險的。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促使資產階級在對勞動人民、對共產主義及其堡壘蘇聯進行鬥爭愈加頑強地依恃改良主義者。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存在着資產階級與改良主義叛徒之間的密切合

作。改良主義者一天也不放過地隨時爲資產階級服務，並從事叛賣勞動人民利益的行爲（世界工聯裏的分裂企圖，爲「馬歇爾計劃」及北大西洋公約進行鼓動以及對蘇聯的誹謗等等）。

在像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及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裏，改良主義者「當權」着。這就是說，資產階級直接地委託工人階級的叛徒來保障其階級統治，並代理其階級利益（在若干國家，他們與資產階級政黨一同參加聯合政府，甚至與法西斯主義的工人走狗合作——如在希臘）。

爲了欺騙工人，改良主義者們宣稱：他們一面「當權」着，同時正在把資產階級統治變成工人階級的工具，並通過世界改革的途徑不經革命而達到社會主義。這種危險的反革命欺騙可以用徹底維護馬列主義關於資產階級國家——不管它的政府是由誰來領導：資產階級抑或「社會黨的」部長——的階級性的學說的方法來加以揭穿和清算。

毫無疑義，一切關於資產階級統治的改良主義錯誤，都是助長工人階級裏的反革命的改良主義欺騙的，因而支持了資產階級；很不幸，這些錯誤發生在我的書裏（雖然與作者的願望相違）。

我的著作裏的改良主義傾向錯誤，在目前不僅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而且對於人民民主國家的勞動人民都是特別危險的。這些國家裏數以十萬計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以及數以百計的左翼社會民主黨領袖，已一個個地轉入共產黨，或者已經集體地與共產黨聯合，他們真誠地願意成爲革命的共產主義者。但是這需要完全地從他們所被教育的改良主義思想裏解放出來，需要受原則的馬列主義的改造。對於這些在改良主義思想裏受過好多年教育的人們來說，這是件艱難的工作；在這裏，有時還有改良主義復活的危險。在與改良主義思想進行鬥爭時，我們的兄弟黨需要和期待着蘇聯科學工作者的幫助。如果我們的工作裏發生改良主義傾向的錯誤（像我所發生的那樣），那末，我們不但不能對我們的兄弟黨給以任何幫助，反而妨礙了他們的改造新黨員——前社會民主黨員——的重要工作。

爲此，我還願意強調指出如下諸點：

公開的改良主義的書籍在這一傾向上所加的損害較小，其影響的爲害也較小，而像我這樣的書，其中改良主義傾向的錯誤是或多或少地隱含的，因之也就難於發見和糾正。●

我的著作裏由於批評而揭發的錯誤具有如此更大的意義：即這些錯誤主要的是關於對當前及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的作用及性質的估計問題。

如所週知，對資產階級國家的估計問題，在這半世紀以來一直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黨人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間發生紛歧的基本點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隨時隨地：譬如在「哥達綱領批判」裏，在對巴黎公社的分析裏，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裏，在「反杜林論」裏等等，正如他們的書信裏一樣，都曾強調指出資產階級國家是資本家的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改良主義者掩蓋了、抹煞了、曲解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家問題上的見解。

列寧曾在其最輝煌的戰鬥的著作之一——「國家與革命」裏對改良主義進行鬥爭。列寧在序言裏寫道，「我們在開頭研究馬克思及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時，要特別詳細地論述這學說中被人遺忘了或遭受機會主義曲解的那一部分」。

列寧和斯大林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原理出發，研究關於國家的學說；他們特別着重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國家乃是法西斯寡頭政權用以掠奪全體勞動人民的工具。

怎麼能發生這樣的事：背離了列寧和斯大林所制訂的、爲一切馬克思主義者所熟知的唯一正確的關於國家的學說，而竟然在我的書裏對國家在戰時經濟中所起作用問題上發生這些改良主義傾向的錯誤呢？

正如對我的批評所正確地證明的，上述錯誤的基礎及出發點，乃是方法論上錯誤地把經濟和政治分離，在經濟與政治的聯繫之外，「純經濟地」推論資本主義經濟底變化的企圖。

脫離了馬列主義的辯證法，沒有對應分析的各種現象的相互關係作必要的全面的研究，還不可避免地要導向改良主義傾向的錯誤。

經濟是各階級間的關係。在一切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是政治的基本內容。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如果試圖（我和前「世界經濟及世界政治研究所」的若干其他著作家曾如此試圖過）「撇開政治」而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那末，這種脫離馬列主義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儘管與作者的願望相反）要導向改良主義傾向的錯誤。

方法論上惡惡地撇開政治及階級關係與階級鬥爭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要導向對於國家在戰時經濟中的作用的不正確估計，要導向關於戰時經濟中「國家的決定作用」的錯誤論斷。如果像我這樣錯誤地「純經濟地」研究國家在資本主義戰時經濟中的作用，那末就要得出如此的錯誤結論：在從階級立場出發來分析的那個國家中，起着決定作用的不是統治該國的金融寡頭。

根據這種皮相的「純經濟的」研究方法，來替代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得出如此的錯誤結論：即爲了戰爭的需要，國家是在違背着各個壟斷資本家的利益的。

我在論及資產階級國家時指出：

「它想要最適當地利用全國一切資源於作戰目的之意圖，會經常地與各個資本主義企業的私人利益，與他們力求獲得儘可能多的高額利潤的利害關係相衝突。」

討論中的發言公正地指出，這種論斷提供了承認資產階級國家的超階級性質之理論根據。不待說，我當然還不至於否認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但毫無疑義，認爲現代國家的特點是

「資產階級整體的組織」，而不是——像應該認爲的那樣——金融寡頭的國家，我承認這是錯誤。

原則上錯誤的方法論造成了改良主義傾向的錯誤，儘管事實本身的敘述是正確的。我具體地說明（第三〇——三一頁），美國和英國的戰時經濟管理機關裏的高級職位，到處都是由壟斷資本的

代表人佔據着。我寫道：「大壟斷資本在戰爭時期也保持其對於國家經濟政策，尤其對於戰時經濟機構的活動起着具有決定作用的影響；大壟斷資本具有決定作用地參加了戰時經濟機構的領導，在事實上領導着它們。」

但是正確確立的事實，如果它們被引證時沒有應用馬列主義方法並離開正確的辯證的相互關係，如果它們在理論上不一般化，則從科學研究的觀點看來就只有無意義的價值。諸如此類的事實應該根據馬列主義的國家理論提出來作為證據，證明國家機器與金融寡頭之間的結合在戰爭期間的更進一步加深，以保證壟斷資本在戰爭時期以及和平時期的超額利潤。

對我的批評還正確的指出我的書裏在國家問題上的其他重要的改良主義傾向的錯誤。在三一八頁上說：「在將來，國家的作用仍然會比在戰前更加大些。關於參加國家管理的多或少的問題，將構成資本主義社會兩基本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資產階級社會日益加深的極端化以及資產階級社會向兩個對立的基本階級的分化，將增大無產階級的比重。」

任何改良主義者都會同意這幾句話。它們是在這種事實的印象之下寫出來的：即緊接着一九四五年戰事結束之後，在歐洲大多數國家——不僅在人民民主國家，而且在法國、意大利及芬蘭等國——共產黨人參加了政府。它們是在這樣的希望之下寫出來的：即各該國的共產黨人在成為反法西斯佔領軍的抵抗運動中的中堅並運用其在羣衆中的影響之後，就能够保持其在政府中的地位，在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中擴大自身，贏得國家政權。

這種思想歷程忽略了這些具有決定意義的事實：即資產階級仍然支配着國家機器；暴力機器（軍隊、警察、憲兵）仍然原封不變。一旦共產黨人在參加資產階級國家的政府之後想要對抗資產階級而堅決維護無產階級利益的時候，他們就會從一切資產階級政府中被逐出。雖然勞動人民給共產黨人以羣衆性支持，但這仍是可能的，因為英美佔領當局預料會發生類似的戰爭，業已解除法、